

[编者按] 为推动海峡两岸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学术交流, 本刊特别约稿, 请台湾的知名学者詹中原教授介绍台湾公共行政研究的状况。该研究分三部分, 本刊将在第六期(第一部分)和第七期(第二、三部分)分别刊登。

台湾公共行政研究(上)

——学科之历史回顾、现状与展望

詹中原*

[摘要] 西方之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发展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来, 已逾百年的历史; 而台湾公共行政之发展, 在张金鉴教授等人的努力之下, 也已迈入了半个世纪之久。在经济成长、社会发展之后, 公共行政与行政管理的角色有何转变, 未来又该向何去? 台湾的这些经验是否可作为重要的参考?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实有必要针对台湾的公共行政学科做一系统性的回顾。本文第一部分试图回顾台湾公共行政的发展, 并以“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公共政策的发展”、“公共行政教育的发展”, 以及“专业学会的发展”四个主题加以探讨。在第二部分, 则从“课程设计”、“学术期刊”与“新兴研究议题”等面向, 分析了台湾目前公共行政学科的主要研究趋势。第三部分, 笔者试图描绘未来台湾公共行政可能发展之重要议题, 其中包含了政策哲学、全球治理、发展史的研究、信息科技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以及行政法之强化等五项。最后, 综合性地提出未来发展的建议与展望。

[关键词] 台湾公共行政研究; 学科之历史回顾; 现状与展望

一、前言

西方之公共行政发展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来, 已逾百年的历史; 而台湾公共行政之发展, 在张金鉴教授等人的努力之下, 也已历经了半个世纪之久。1991年12月, 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举办“纪念张金鉴教授八秩晋九诞辰行政学术研讨会——公共行政教育内涵之精进”。在此会议之中, 学者们从不同面向指出台湾公共行政教育面对之问题与发展的方向。时至2002年11月, 在“张金鉴教授百龄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中, 学者们对于台湾公共行政之教育再次进行了回顾与讨论。

关于台湾公共行政与行政管理的角色有何转变? 未来又该向何去?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实有必要针对台湾的公共行政学科做一系统性的回顾。是以笔者在此, 首先对台湾公共行政的发展, 透过公共行政、公共政策、教育发展及专业学会进行回顾, 其次将对台湾公共行政当前的研究趋势进行检视, 最后则试图对台湾公共行政学科未来之展望, 提出些许建言。

二、台湾公共行政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此处笔者将从“学术发展之回顾”、“研究典范”及“行政改革实务”等三个部分来做探讨。

(一) 学术发展之回顾

台湾公共行政学早期的研究, 仍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之一; 至1960年左右, 行政学始开始独立设系。回顾台湾的公共行政学术之发展, 缘起于被誉为“中国行政学之父”的张金鉴教授等人的努力, 初步可将台湾公共行政学术的发展区分为下列三个时期:

收稿日期 / 2005-04-20

作者简介 / 作者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政策哲学博士, 现为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教授。

1. 初始期

本时期自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初,重要的学者及其著作包含如张金鉴教授(1956, 1960)的《行政学》与《人事行政原理与技术》,奠定了台湾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根基。姜占魁教授(1965)之《人群关系》,为台湾行政组织理论发展建立基础。华力进教授(1967, 1971)的《各国立法机关分析说明》及《美国公共行政的改变》,促进了台湾比较行政研究。傅宗懋教授(1967)之《清代军机处组织及执掌之研究》,则令吾人了解台湾行政之研究与清朝行政组织之关联性。缪全吉教授(1969)之《明代胥史》,以及雷飞龙教授(1972)之《英国文官制度》等研究,实已成为台湾人事行政之重要基础。

1970 年代,随着台湾自行培育之师资,以及国外留学回台之学者渐增,公共行政的领域也逐渐扩展。诚如张润书教授(1973)的《行政学》延续了张金鉴教授研究,成为台湾公共行政经典的教科书。彭文贤教授(1977, 1983)的《蜕变研究法的组织设计之分析》及《组织原理》,为台湾组织理论的研究扎根。就台湾公共行政学科中,行政法研究的先驱则为张家洋教授(1977)之《行政法概要》一书。除此之外,许滨松教授(1978)之《人事行政》为台湾人事行政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而吴定教授(1979, 1991)在《机关管理》一书中,也对组织管理有许多深入且重要的见解。最后,薄庆坎教授(1979)的《地方政府》一书,为台湾地方政府研究的早期重要著作。

从上述初始时期的重要学者之相关著作,可发现台湾公共行政在初始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归类包含如:行政学理论基础、组织理论与管理、行政法、人事行政及地方政府等。

2. 充实期

至 1980 年代末起至 1990 年代中期,随着台湾社会改革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者返台,为台湾公共行政的学术发展带来丰富、多元,且不同风貌之发展。在此时期中,除了初始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外,许多新兴的研究议题也不断地受到不同学者的关注。简述相关重要的议题与著作如下:(1)危机管理(詹中原, 1990);(2)行政信息管理(PMIS)(詹中原, 1992);(3)行政学研究之方法论(吴琼恩, 1992; 颜良恭, 1992);(4)民营化政策(詹中原, 1993);(5)公共财政及预算(苏彩足, 1994);(6)非营利组织(陈金贵, 1994; 江明修, 1995);(7)公共组织理论(江岷钦、林钟沂, 1995);(8)人力资源管理(施能杰, 1994, 1995; 彭锦鹏, 1995);(9)管制行政(周育仁, 1994);(10)地方自治与法治化(黄锦堂, 1995);(11)公共环境与事务(汪明生, 1996);(12)公共管理(孙本初, 1997; 詹中原, 1999)等各项议题的研究,纷纷受到重视。

上述这些研究的产出,除反映出行政学界研究领域的急速扩大外,也反映出了行政学的研究正逐渐地与台湾社会的多元发展逐渐结合。

3. 多元发展期

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新一批学者的学成,此时台湾社会亦迈入另一改革的阶段。尤其进入 21 世纪之后,全球化及数字化的影响,也促使着行政学界发展新的议题与研究来加以因应。学者们或基于上述的议题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或对于新兴的议题展开探索,兹举如下:(1)行政伦理(顾慕晴, 1996; 萧武桐, 1998);(2)公共财务管理(徐仁辉, 1998);(3)电子化政府(项靖, 1999; 黄朝盟, 2001; 萧乃沂, 2003);(4)新制度理论(汤京平, 1999; 陈敦源, 2002);(5)政府管制行政(庄国荣, 1999; 张其禄, 2002);(6)组织网络与治理(史美强, 2000);(7)第三部门的本土发展(官有垣, 2000);(8)行政治理(余致力, 2000);(9)府际关系(赵永茂、孙同文、江大树, 2001);(10)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与小区安全(李宗勋, 2001);(11)签约外包与民营化(李宗勋, 2002; 林淑馨, 2003);(12)绩效管理(黄朝盟, 2003; 张四明, 2003);(13)全球治理(宋学文, 2004);(14)公部门之知识管理(刘宜君, 2004)等相关议题。

从上述多元发展时期的研究议题来看,可发现台湾公共行政之研究,随着社会时代之演进,而有了更丰富的内涵。除此之外,本时期的研究,例如电子化政府、第三部门、社会资本、全球治理及知识管理等主题,也更加呈现了台湾公共行政学科当前跨学科研究与整合的特质。

为了界定近 20 年来台湾公共行政研究的旨趣,孙同文(1998a)以 1990 年以前台湾公共行政期刊论文为样本,其利用内容分析法,检视过去台湾行政研究所涉及的智能活动与主旨。结果显示,1990 年代前,台湾公共行政理论界与实务界之间缺乏双向沟通,学者无法从实际范例中检验理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行政人员似乎又学不到他们想要知道的讯息,形成理论与实务脱节或是知识运用的落差。除此之外,其进一步指出部分规范性的价值(公平性、责任、代表性)并未能得到相对的重视,而过去台湾行政研究所强调的“效能”与“效率”之间的论战,或可回溯到传统公共行政典范的探讨。

(二) 研究典范

论及研究典范,则不可不回顾 1990 年代初台湾公共行政学界之讨论。由于西方在 1920-30 年代的行为主义(behav-

iorism)开始之后,实证论(positivism)对公共行政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其强调科学化的测量以及理论通则之建立,主张价值中立(value-free)及量化(quantitative)研究方法。然而,在1990年代左右,新一批自国外返台的学者,对于量化研究中的价值中立纷纷提出了反思甚至批判。例如,吴琼恩(1992)、江明修(1997: 89-94)等人,均曾对量化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与批判。基于此,吴、江二位学者提出应该重视以自然论、诠释论为主的质性(qualitative)研究方法,并进一步建构属于台湾本土的公共行政学研究。

这种针对何种研究方法较“好”的问题,经过学界几年的论战之后,学者们也渐渐同意研究方法是探求社会科学现象的工具角色,其性质为中性的,而非质化一定较量化好,亦或量化途径优于质化途径。换言之,在不同的研究目标、取向、系络中,则应当考虑到不同的研究方法之设计。由此点观之,学者们对于方法论有了最基本的共识后,也开启了公共行政的多元研究。在量化的研究上,关于台湾行政精英的政策议题调查(余致力,1999)、行政人员专业化程度(孙同文,1999)及电子化政府实践程度(项靖,1999)等实证的研究资料逐渐的累积;而在质性的研究中,例如丘昌泰(1994)、官有垣(2000)、朱景鹏(2004)等许多不同的个案深度访谈、田野调查等,在台湾的公共行政也日益受到重视。

(三)行政改革实务

以实务的行政改革而言,在1955年黄季陆先生即已组成“行政院及其所属机关组织权责研讨委员会”,然论及规模与影响者,在1958年由王云五先生所主持的“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系台湾改革开放前所推动的行政改革规模最大、成效最佳影响也最深远者。回顾其成立之缘起,是由于在1957年,王云五先生代表台湾参与联合国大会。在他回台后,将其在美国所见之资料及调查结果,汇总提出关于科学管理与行政效率之报告,并获蒋中正先生认同,旋即成立行政改革委员会(江明修、蔡金火,1996;张润书,1998)。“王云五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有六个月时间,在此阶段中,则分别设立行政、教育、财政金融等十个组别,并提出八十八项行政改革之建议方案,对当时台湾的行政管理产生重大之影响。

自上述的王云五委员会之后,台湾行政实务界后又历经了陈雪屏、蒋经国及孙运璿等人主持的行政改革方案,历次均有不同的重点与成效。例如,在蒋经国时代的十项行政革新运动,在当时主要目的是为澄清政治风气,在蒋经国先生的身体力行之下,获得良好的成效。关于台湾近半世纪来较为重要之行政改革实务,整理分述如下:

- 1 1955年10月,由黄季陆先生主持“行政院及其所属机关组织权责研讨委员会”,系为台湾政府第一个行政革新委员会。
- 2 1958年3月,由王云五先生主持“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为台湾改革开放前规模最大之行政改革委员会。
- 3 1969年3月,由陈雪屏先生主持“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为台湾政府第一个负责督导行政改革业务之常设机构。
- 4 1972年6月,由蒋经国先生主持之“十项行政革新”,澄清当时政治风气,成效颇具。
- 5 1993年9月,由连战先生主持之“行政革新方案”,三大重点之一即为便民,系为新公共管理中“顾客导向”之实践。
- 6 1998年1月,由萧万长先生主持之“政府再造推动委员会”,系受英、美等国新政府运动影响,诉求台湾行政组织在组织、人力及服务以及法制三个层面的政府改造。

学者张润书(1998)综合分析指出这些时期的行政革新具体的成效,如:1. 推动研究发展、建立管考制度;2. 强化行政组织、贯彻分层负责;3. 例行公文改革、精简法令规章;4. 健全人事制度、刷新行政风气。从上述的行政改革实务也可发现,在台湾社会发展变迁后,一方面民众要求政府应当更有效率;另一方面,也呼吁政府行政过程应有更多民众之参与;再加上欧美等国自1980年代起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浪潮,因此促成了台湾在1990年代开始的“政府再造”理论与实务上革新。诚如连战、萧万长等人,均视政府再造方案式为施政的重点之一。由此看来,尽管在学界对于此波新公共管理理论有多元正、反之看法,然而在实务界上,台湾的政府再造运动仍方兴未艾。

三、台湾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

(一)发展背景

根据台湾公共政策研究的早期学者指出,台湾公共政策研究的起源,可回溯自1970年代初期起,主要有两个相关背景:其一为台湾政治大学的客座教授麦克白在该校政治学研究所开设一系列公共政策相关的课程;其二,国内的部分,除台湾政治大学的郎裕宪教授及张彝鼎教授外,当时台湾中兴大学(现为台北大学)的汤绚章教授,也开设公共政策一系列相关的课程、创立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并且邀请学者Shaeffer来台进行一系列演讲。至1970年代末期,台湾国科会设置了“公共政策教育研究计划”,以及教育部门在1979年由曹俊汉教授的建议下,设置了公费留考的科目,皆有助于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詹中原,2003: 357)。

詹中原(1996)检视台湾早期的公共政策著作来看,对于公共政策意涵的界定,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Lasswell对公共政策的界说,这显然与Lasswell在公共政策研究史上的先驱性地位有直接的关系。到了近十年的著作,学者们对于公共

政策的定义似乎都已经得到共识,这方面的讨论就比较少,这也说明台湾公共政策的研究渐渐走向较为成熟的阶段。综合言之,台湾公共政策初期的发展,以理论介绍为主,实务的课程较少。而主要的架构,则以国外学者 Charles Jones 与 James Anderson 等人的阶段为主,主要的目的为引介国外重要的政策知识(詹中原,2003:357)。

(二) 发展阶段

按笔者近二十年对台湾公共政策之研究,以下将台湾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区分成三个阶段来加以介绍(詹中原,2003):

1. 初始阶段

在初始阶段(早期),公共政策之发展是靠个人的能力,而非学有专长的社群力量,政策的定义也多半继受自国外学者,同时较不强调科际性的特色。这个时期的存续大约在1970年代。

早期公共政策的起源显然与当时政治环境有关,学者曾表示,台湾政策学科系因应政府的需求而产生,其它学者也多有因应潮流与时势的看法。这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产生实在符合“统治能力”扩张的需求,就公共政策的特性来看,便是解决问题能力的需求。此一解决问题能力的需求,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如学者曾认为,1970年代,台湾受到经济现代化的影响,于社会上开始有“多元化”的倾向,此一多元化,代表政府任务的增多,虽仍属于政府集权模式,但经济起飞带来的社会变迁,已反映在政策的需求上。回顾台湾公共政策早期历史,似已印证政策科学的实用性价值。

至于在分析架构方面,由于早期研究者多半为政治学科出身,因此也多使用政治的途径,一部分学者则尝试以管理的途径作为分析的架构。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公共政策的定义较为模糊,也多半属于介绍国外理论的层次。所谓科际性于此阶段并不明显。在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上,早期并无一具有优势(domain)的主体,这和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从前文公共行政的研究典范亦可得知,台湾社会科学早期并不注重方法论,连带地使政策科学的引介也受到若干限制。

2. 充实阶段

在1980年代起的充实阶段(中期),政策科学在积极的需求下加速发展,学术社群也持续地增多、增广,从当时期刊论文的出版数量即可了解这个事实。在这个时期,社会的多元性已更加显著,政治亦然,例如异议人士开始组成正式政治团体,威权体制开始松动,其后解除戒严、开放报禁、集游法及人团法相继通过,此时政策意涵已不尽如前期之单纯,政策的类型也开始转变。诸如,管制性政策受到挑战,重分配性政策频频进入政府议程。此变动也促使政策研究愈发受到重视。

当时由于台湾政府鼓励归国学人的政策,许多专攻政策的学者纷纷返国,并引进公共政策的传统观念,在分析架构上,以阶段论为主,方法论则和其它社会学科一般,以逻辑实证论为优势的典范,当然研究方法也主张量化的法则。事实上,逻辑实证论亦难免有所大限制,尤其进行政策规划研究者,不但在指标选取上较为困难,也无法以实证研究支持较大范围的计划。也正因如此,政策研究虽然不断充实,但实际在应用上仍然不多,尤其是一些技术和方法,部分看法指出,在此时期的部分政策研究,于实务的应用上仍有所困难。

3. 扩展阶段

自1990年代初期起的第三个阶段为扩展阶段(当前的发展),之所以称为扩展,系因此一时期不仅只是知识的累积阶段,包括政策定义、分析架构在内的政策相关概念,均已产生实际的变迁,而学术理念也呈现多元化的现象。此阶段的扩展,已不单是学科深度的累积,还涉及学科广度的扩充,就整个社会科学来说,科际交流频繁,而政策理念也不断突破与创新,批判论、诠释学观点的加入,都使政策科学的发展呈现新貌。

此时期固然已引进非阶段论的观点,并强调质量整合的方法,但需注意的是,此发展趋势似与目前公共政策实务的情境有所差距,例如,在有关台湾政策个案分析中,即已说明了实务界的政策过程仍以阶段论为其主体。此外,如执政者的理念及人民的观念是否已达政策科学发展的水平,皆已受到重视。最后,在研究上也按上述的方向作适度的调整,以针对台湾特有的系络,进一步提出有用的(useful)公共政策之学科知识。

(三) 台湾公共政策之专著

回顾台湾公共政策的专著,可回溯至1978年由汤绚章教授汇整的“公共政策之研究”,其内容包含了Shaefler来台演讲、主持研讨会议的汇整以及草拟公共政策硕士班课程之计划等。此外,1979年由朱志宏教授所写的“公共政策概论”,实为台湾公共政策研究的两个主要奠基著作。

在充实阶段,部分台湾公共政策研究的先驱者也出版了重要的著作,例如魏镛教授(1983)的《政策规划的理论与实务》、林水波与张世贤(1984)二位教授的《公共政策》、伍启元教授(1985)的《公共政策》以及曹俊汉教授(1990)的《公共政策》等著作,初步描绘了公共政策规划与研究的理论轮廓。吴定教授(1989)的《公共政策个案集》,为台湾第一本关注

公共政策个案之专书。

自 1990年起的扩展阶段,公共政策相关著作逐渐的有了多元丰富的内容,例如柯三吉(1991)的《政策执行:理论与台湾经验》,将焦点至于政策阶段论的执行过程上。詹中原(1993)的《民营化政策》,为台湾公共行政学界第一本探讨民营化政策的专论。林钟沂(1994)的《政策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利用批判理论为架构,将焦点至于政策分析。丘昌泰(1995)的《公共政策—当代政策科学理论之研究》之书,则透过方法论来为台湾公共政策科学研究定位。郑兴弟教授(2003)也综合了过去 20余年的研究成果与心得,出版了《政策规划—理论与方法》一书。

至 2003年,笔者审视了新世纪的公共政策研究趋势,提出了“新公共政策”(New Public Policy, NPP)的概念,并出版了《新公共政策—史、哲学、全球化》一书。当然,笔者所提出之新公共政策之意涵并非只代表时间较新,更不意指在内容上超越了古典公共政策对政策学科的贡献,其主要意义在于 1980年后,公共政策知识典范变移的事实。在 1980年代之后各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受到以新右派(The New Right)为名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与新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政策哲学冲击,其政府管理思维产生剧变。对于医疗、教育、老人、消费者、民营化、电讯、国防政策的规划、执行及评估范围方法,都产生了有别于古典公共政策的根本转变。笔者以“新公共政策”名之,最终的期望,则在于希望能替台湾公共政策的研究,注入些新的研究元素。

四、台湾公共行政教育之发展

(一)相关系所的设立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公共行政教育推动成为政府和大学相关系、所的重要主题。由于在时代环境的变换下,公共行政教育正面临一个转换时期,其原因是政府大规模推动公务人员的训练,成为另一个公共行政教育的推动手,以及许多新的公共行政相关系、所纷纷成立(陈金贵,2002)。

关于台湾公共行政相关系、所之演变与发展,在初期是缘起于 1960年代,并是由政治学中脱离而设系。1963年,原先在政治大学政治学系下设立的“公共行政组”,正式独立设为“公共行政学系”。1955年,台湾省立法商学院设有行政学系,而至 1961年,该学院更名为中兴大学(现为台北大学),至 1967年,中兴大学行政学系正式改称为“公共行政学系”。上述台湾政治大学与中兴大学,乃为台湾最早设立公共行政学系之大专院校。

1963年,文化大学设有行政管理系夜间部,而淡江大学也于 1964年设立公共行政系夜间部,乃属于进修教育之一。此二个系在 1997年也改变学制,成为日间部的正规教育。在 1980年代,设有公共行政学系的大学渐增,例如东海大学在 1986年,公共行政系由政治系独立出来。1986年,空中大学成立公共行政学系。

自 1990年代,随着台湾渐渐开放,公共领域受到更多公民的关注,再加上前述关于公务人员进修的需求、全球化的来临,台湾政府与教育体系逐渐重视公共事务管理人才的培育,在许多大学中开始成立公共行政及行政管理的相关系、所。截至目前为止,台湾约有 23个公共行政相关系、所,而由各个系、所成立的名称也可发现,台湾公共行政领域的内涵也更加多元化。诸如 1991年警察大学设立行政管理系、1992年台湾中山大学成立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1996年世新大学成立行政管理系所、义守大学于 2000年成立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系等。较特别的是目前在台湾大学、中正大学及东吴大学中,公共行政仍属于政治学系所中的一个组别。

(二)博士班之教育

以博士教育而言,在台湾各大学公共行政相关领域中,最早成立博士班者是于 1956年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研究所。1962年,由于政治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建教合作,推行公共行政学及企业管理教学计划,在政治学系增设公共行政组,至 1963年成立公共行政学系,并于 1964年成立硕士班,但是博士班还是设置在政治学研究所公共行政组之下。此外,台湾大学亦于 1976年成立博士班。上述的博士班皆设立在“政治学”之次领域中,而关于公共行政博士班的正式设立,则系在 1989年,由政治大学始于台湾设立第一所“公共行政博士班”。尽管如此,1980年代末正是台湾社会转型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事务也更加受到重视。反映至学术界,一些大学也开始设立了公共行政相关系所博士班,例如,台北大学(1994)、中山大学(2001)、世新大学(2005年起开始招生)等,纷纷成立公共行政相关领域的博士班(谢俊义、王俊元,2004)。

(三)MPA公共行政在职专班之教育

近年来,为建立多元弹性之高等教育回流体系,强化公务人员在职进修以及落实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台湾的许多大学纷纷成立了公共事务在职专班(master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例如,政治大学社会科学院于 1999年开始招收“行政管理硕士学程”之在职研究生,学程中包含有两岸研究组、财经研究组及一般行政组,招收的对象为公务员、或具有一年以

上工作经验之在职人员。东海大学于 1999 年也开办了公共事务硕士专班,并区分为公共管理组、公共政策组及地方政府与政治组等三个组别。中山大学也于 1999 年设立公共事务研究所在职专班,成立公共事务管理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以提供南部地区各公民营机构人员进修与强化政策单位决策人员的培训管道。

除此之外,台北大学也于 2000 年设立了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硕士学程,主要课程包含了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等专题。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于 2001 年成立了政府与公共事务在职专班,主要系基于公共管理理论及各国政府革新经验,培养公私部门中高阶主管之宏观视野与专业技能。其余各校之公共事务硕士在职专班,例如世新大学(2001)、淡江大学(2003)等,也都已陆续提供各地公务人员进修管道。

综合来看,台湾的公共事务在职专班目前处于方兴未艾的时刻,有越来越多的公务员采取这种进修的方式。然而,未来如何在提升学习质量、如何落实终身教育、如何使在职学生学以致用以及如何规划具有不同特色之公共事务硕士在职专班教育,是各系所应当思索之课题。

最后,回顾台湾公共行政教育的发展时,江明修(2002)曾检视了台湾公共行政教育的现况,从一些面向提出相关之建议。例如,在课程设计上,应增加有关“公共性”之课程;在师资上,专任师资一半左右具有美国学位;最后关于在地化、弱势及伦理等议题,也应被关注。曹俊汉(2003)则台湾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教育与学术层面,指出当前台湾学界关于伦理议题研究有所忽视,此反映到社会面向上,则易使媒体炒作,政策辩论空间萎缩以及公民参与的不足。诸如上述的各点,皆是未来台湾公共行政教育发展的核心课题。

五、专业学会的发展

台湾目前公共行政学界中重要学会说明如下:张金鉴教授于 1954 年在台成立“中国行政学会”,并于当年 10 月 24 日在台北市举行成立大会。此学会于 1943 年 7 月,曾由杭立武先生、张汇文先生、张金鉴教授等三十余人在重庆成立,当年会员资格以在大学曾任行政学教授者为限(张金鉴,1972:359),而在台之中国行政学会仍以学校教授学者为主体。中国行政学会出版《中国行政》半年刊,由吴志道及雷飞龙教授等人先后担任主编(张金鉴,1972:360)。此外,此学会亦曾先后办理多次学术研讨会,而此学会目前由吴定教授担任理事长。

第二个重要专业学会为“公共行政学会”(Th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sociation),此学会之成立可溯自 1954 年起,并可区分为三个阶段,自 1954 年至 1970 年,由吴英荃教授等人发起,成立“台湾省普通行政学会”,到了 1970 年 10 月,则更名为“台湾省公共行政学会”。至 1988 年,在台湾省公共行政学会及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下,成立了“公共行政学会”。观诸近十余年来,公共行政学会举办过多次的学术研讨会及座谈会,亦曾接受相关单位之委托,从事学术的研究调查,而更重要的则系于 1991 年开始出版《中国行政评论》的学术期刊(詹中原,2003;谢俊义、王俊元,2004)。

近期新兴之学会为“中华国家竞争力研究学会”(Chines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其成立于 1998 年 10 月,由詹中原、陈金贵、汪明生教授等二十余人发起成立。其以非营利为目的,并积极提升国家竞争力之人民社会团体。主要任务包含,参考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及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之年度竞争力评估指标,进行关于行政及政府治理管理之研究,并推展产、官、学理论与实务之验证。

至 2003 年 6 月 21 日,台湾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系所联合会(Taiw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TASPAA),在台北政治大学企公中心举办成立大会。此联合会为仿照美国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系所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NASPAA),主要成员涵盖台湾将近二十个相关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以及行政管理学系等系所。在成立大会上,由于落实民主治理暨推动行政改革实为台湾刻不容缓的工作,积极策划办理“民主治理与台湾行政改革”学术研讨会,期以观念的倡导、实务的反省以及各界意见的交流,为台湾当前的重要行政改革暨政府改造工作提供具体建言,并期藉以提振公共行政等相关系、所的学术研究风气、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培育新时代行政管理人才(詹中原,2003)。(待续)行

[作者单位] 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家人

当然,公共事务相关协会不止这文中所述这些,目前已登记而较重要者尚包含公共事务学会、公共事务管理学会、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会、公共政策学会、人事行政学会,以及台湾透明组织等。

《中国行政》目前由台湾政治大学企公中心发行。

官方网站为 <http://211.21.17.26/paamc.org.htm>